

# 青救会：陕甘宁边区的生力军

□ 郑学富



安吴青训班领导与部分干部学员合影

1922年5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中国青年团组织正式诞生，距今已有100周年的历史。在共青团百年历史中，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一个特殊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将共青团改造为非党的青年组织——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青救会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青年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团结全国广大青年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把陕甘宁根据地划分为两省三特区，团中央（当时叫少共中央局）即相应建立了少共陕甘省委、少共陕甘省委、少共关中特委、少共三边特委和少共神府特委，红军西征时又成立了少共陕甘宁省委。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党中央明确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基本策略和任务，会后又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使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为了促使共青团更加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要求。1936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保安召开，对共青团的改造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作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根本改造共青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引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决定》还详细规定了改造共青团的具体办法：取消国统区团组织，建立公开半公开的各种各

样的青年组织；大批吸收团员入党；彻底改变工作方式，采用青年的民主的公开的活动方式开展青年工作；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共青团必须全部改造成青年的联合组织等。团中央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精神，在根据地实施了共青团改造工作。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各级青救会。

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等出席大会并分别讲话，希望青年团结起来，为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西北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机关，并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前，西北青救会为全国各地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决议》和《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等，确定西北青救会的宗旨是“团结西北和全国青年，建立不分阶级、党派、民族、信仰的青年统一战线”，其中心任务是“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而奋斗”。12月，西北青救会将会址移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后，又组建了陕甘宁特区青年临时救国会，以继续加强对陕甘宁特区青年救亡运动的领导。

1938年4月15日，毛泽东为西北青救会成立一周年题词在《新中华报》发表。题词是：“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向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5月，中共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以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10月2日至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10月10日至11月21日，西北青救会在延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的除西北青救会的代表外，还有西南、华北、华南、南洋等地的青年团体和青年工作者的代表。大会选出西北青救会新的领导成员。为了加强各地青年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团结和统一，大会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这样，西北青救会、中华青联办事处和中央青委三个机构合署办公，一套班子，形成了以中央青委为核心的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机关。

为加强青年干部的培养，1937年10月，经中央批准，西北青救会在陕西三原斗口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农场创办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冯文彬任主任，胡乔木为副主任。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于青训班的创建和发展十分关心。1937年12月，毛泽东专题听取了冯文彬的工作汇报，当得知青训班缺少教员时，立即指示中央有关方面在干部力量和经济方面给予支持，中央组织部从抗大、中央党校等地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如黄春霖、李东潮、刘瑞龙等前往青训班，大大增强了青训班的教学力量。1938年初，因青训班学员人数增长过快，云阳镇无法容纳，校址便迁往

安吴堡，所以又称“安吴青训班”。安吴堡这个陕西泾阳北部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的向往之地，他们冲破道道关卡，接踵而至，云集安吴堡。

青训班的校训是：坚定刻苦，勇敢活泼，民主团结，虚心切实；宗旨是：在最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军事政治知识；开设的课程有抗战基本理论（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军事课程（操场动作、武器使用、步兵技术、游击战术）；学习期限半个月至3个月，学员除上课外，着重自学，参加野营训练、下乡宣传、组织民众抗战等实践活动。

在青训班受训的青年干部，尽管出身不同、信仰各异，但他们在这里接受的是革命人生观和抗战建国本能的培训，进而成为具有民族觉悟、抗日军政知识、拥护共产党领导和国共合作的抗日战士。在国民党反共愈加严重的形势下，1940年4月，青训班奉令撤回延安。之后，青训班全体学员进入“泽东青干校”继续学习。

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西北青救会发挥各级青救会组织在战时宣传、教育中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发动。西北青救会积极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在1939年以前，共动员8000多人参加主力部队。1941年，为响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政府的号召，在边区各级青救会的动员和干部带头下，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到7月底就有1598名青年入伍，奔赴抗日前线。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供给出现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1940年12月2日，边区青救会召开了各县青救会经济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边区青救会经济部，县、区青救会设经济科，统一组织和领导青年参加边区的经济建设，并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高自立担任边区青年经济顾问。青救会将创建青年农场作为青年投入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心。边区青救会在延安等11个直属县试建青年农场取得成功，随即出现青年合作社、青年变工队、青年运输队等，在陕甘宁边区农场中普遍推广，调动了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上也收到良好的效益。

西北青救会还协助边区政府创办青年钢铁厂、青年纺织厂、青年造纸厂，开办青年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工人，积极钻研推广先进生产技术。许多青救会会员带动青年家庭发展家庭手工业，组织青年工人制造生活用品。

青救会是抗战时期各种抗日青年组织的总形式，极大地丰富了青年团的工作理论和指导思想，为正确规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性质、任务和工作原则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为共青团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共青团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初建的年代，全国各地工人斗争浪潮此起彼伏，如：1921年7月，上海英美烟厂8千多工人大罢工；1922年1月，香港10余万产业工人大罢工等，许多地区的工友联盟、产业工会也蓬勃兴起，被当时的报刊称“秋花之怒放，夏水之暴涨。”

工人运动虽轰轰烈烈，但因缺乏统一领导、周密部署、联合互动、强势支撑等，不可避免出现了力量单薄、松散无援、方式单一、影响范围小，难以保持胜利成果等后果。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以推动工人翻身解放、独立自主进程为己任，为组织领导、运筹谋划工人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书记部”通过了解、分析“工运”的现状和形势，认为必须组织召开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建立劳动团体联合战线、密切各地工人组织之间关系，掀起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经周密研究、紧张筹措，“书记部”确立了“不分地域、不分党派，只要是工会组织便可派代表参加大会”的原则，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识整体、顾大局，不限观点立场、不究矛盾争执，为工人解放事业同聚一堂、共谋大计的宽广胸怀。

1922年4月11日，“书记部”在《民国日报》上发出《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邀请全国各工人团体代表1922年5月1日在广州报到：“五一纪念节在适宜地点召集全国劳动大会，本‘书记部’认为有举行必要，特拟定宗旨及办法列下……请贵团体选派代表一人，持贵团体选派证书，如期赴会为宜。”

通告发出，得到各地工人团体的积极响应，5月24日的《民国日报》发消息说：“接到通告的工会，都大为欢欣，竞派代表与会。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等各代表赴粤者约三、四十人，加上广州各工会代表，合计竟达一百六十余人，代表工人三十余万。”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广东机器工会礼堂”开幕，与会代表来自全国110多个工会和工人团体，有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等共173人，中共代表有：李启汉、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等倍受拥戴的“工运”领导人。

6天的会议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听取“书记部”关于大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域工人斗争情况；大会发言；讨论提案等。由于代表派别有异、人员复杂，立场不同，讨论时常发生激烈的分歧和争执，主持大会的共产党人采取协商表决、求同存异等办法排解纠纷，化解矛盾，牢牢把握大会的宗旨和方向，保证了日程的顺利进行。

大会期间，收到代表提案近百件，经审查委员会整理归纳、评议审核，最后讨论表决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案》《规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案》《八小时工作制》等10件提案。其中最受关注、最重要的6件均是中共代表提出来的，充分表明大会对中国共产党意愿、主张的赞同和支持，也让共产党人倍加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了肩负起领导工人运动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大会发布的《第一次劳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要把各地工人们按照产业组织的工会，联络起来，组织各种全国的产业总工会……无论哪种或哪个地方的工人们对于资本家的奋斗，都是我们这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奋斗；我们必定要互相援助，才能得到胜利。”

《第一次劳动大会宣言》不但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也确立了中国工人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邓中夏曾经描述说：“根据一次‘劳大’的决议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派别、组织携手合作的里程碑，开创了工人阶级联合奋斗的新纪元，把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时期。



## 《岁月如歌》出版

近日，临洮县政协文史委员、1949年8月参军赴新疆的军垦老兵孙恪剑的《岁月如歌》回忆录出版。这是临洮县政协2021年全力以赴策划、组织编撰完成的向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华诞献礼的3本图书之一。

该书大32开本，彩色印刷，196页，全书以“亲历、亲闻、亲见”的文笔，通过“成长之路”“参军进疆”“志壮天山”三部分，系统记录了93岁高龄、党龄65年的作者，出生在洮河岸边苦难成长的历程；1949年8月16日临洮和平解放后的第2天，在其大哥、中共地下党员孙恪琴带领下，成为临洮最早报名参军并随部队解放青海、甘肃河西、进军新疆的18名临洮儿女之一；随王震大军解放新疆、扎根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难忘岁月。该书既是作者记录家乡1949年1500多名优秀知识青年参军赴新疆的珍贵史料，也是记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岁月的个人亲历史料。该回忆录的出版，也给当前的“学党史”和红色传承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本土教材。

张晓东

# 中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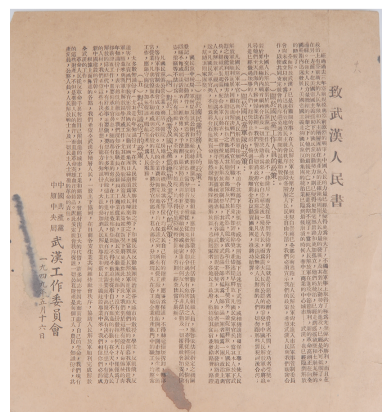
□ 周文洋

## 见证武汉解放前地下党活动的宣传品

□ 李笙清



图一



图二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兵锋直指武汉，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白崇禧率国民党军队从武汉仓惶逃离。5月16日至17日，武汉三镇兵不血刃获得解放，广大市民载歌载舞，欢庆江城回到人民手中，武汉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篇章。在武汉解放前夕，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冒着流血牺牲的风险，开展秘密活动，进行统战策反，为武汉的顺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城工部油印的《新华电台特讯》（图一），纸质，油印于1949年4月21日。上部用艺术字体注明宣传品名称“新华电台特讯”及编印单位“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城工部印”，印刷时间是“一九四九四月二十一日”。“特讯”下面有“第一版”字样。下面的内容区，刊载了来自解放区的新华电台报道内容，第一条醒目地刊载了《南京反动政府拒绝人民和平要求，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四项命令》的标题及命令全文，在指出和平协定破裂是因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之原因的同时，对各野战军发布了“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命令。左下角刊载了人民解放军在太原战役中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城工部秘密收听、抄录、印刷来自新华电台的新闻信息在武汉三镇张贴、散发、邮寄，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宣传了解放区的政治方针，瓦解了国民党守军军心，对策反国民

党武汉高官亦起到了一定作用。

武汉解放前，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地下活动。据1946年6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给中共华中局的反映武汉解放前地下党情况报告显示，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的主干是由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的390名党员及1500至2000名党外核心分子；另一系统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及各解放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计11个城工部，共有派遣人员和各种城工关系约2800人，其中党员50余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约950人。

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运用各种条件，建立秘密收听站、地下印刷厂，通过收音机收听抄录新华社及各解放区电台广播，大量翻印《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毛泽东著作及中共中央文件等重要文献，创办油印小报。进行这些秘密活动的地下党员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中共武汉市委青年组的汉口地下油印小组，就潜伏在国民党华中“剿总”武汉守备司令部驻地对面的中国实业银行汉口分行里；武昌的地下印刷所设在国民党考试院两湖考铨处的大楼里，旁边就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大楼。地下党员们就这样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印刷了60多种、12万多份文件和宣传品，秘密输往武汉三镇及沿江城镇，其中仅江汉三地委城工部就印制、散发了42000多件各类宣传资料。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余

杰领导的城工人员将通过收音机收听抄录的新华社及各解放区消息及时刻版油印成《新华电台特讯》宣传品，秘密张贴、邮寄和散发，在加强当前形势、中共政策的宣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致武汉人民书》（图二），纸质，竖行排列。告示形式，针对武汉解放后国民党工作人员、国民党残余军队、国民党特务人员、工商业及国民党伪机关、各单位、知识分子分别制定了完善的政策。前面引文开宗明义，振聋发聩：“……当此人民解放军在进攻中节节胜利，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向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美国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业已临到最后崩溃的时候，华中工商业的中心城市——武汉，也已经临到解放的时候了。”

看《致武汉人民书》内容，显然是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入市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尚未成立以前”，目的是为了在武汉解放后迅速在武汉有效建立民主社会秩序，“保障各阶层人民民主自由生活”，避免武汉解放后出现“过渡期间的混乱和脱节”。

这份《致武汉人民书》是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制定并印发，旨在武汉解放后，面对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城市里实施多项政策，稳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为即将建立的人民政府打下基础。